

● 书 评

化难为易 品出真意

——读《李商隐诗集今注》

陶 佳 珞

(武汉大学出版社,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陶佳珞(1958-),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出版社副编审,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3-0384-02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上一颗独放异彩的明星。他只活了 45 岁,却留下了大量不朽的诗篇。他的诗典丽精工,幽深婉曲,寄慨遥深,独树一帜。当人们读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动人心魄的诗句时,谁不心灵震撼?毛泽东最喜爱的诗人中就有李商隐。然而李商隐的诗又是很难读“懂”的。他不仅人生经历复杂坎坷,而且创作的大多数诗歌用典繁多,语言隐僻,迷离恍惚,往往使人很难把握真意,甚至成了难解之谜,要为他的诗作出实事求是的笺注是非常困难的。元好问就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叹。明代以后,为李商隐诗作笺注者渐多,见仁见智,其说不一。清乾隆年间,冯浩著《玉溪生诗笺注》,可谓对前人的注释评点作了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古典文学界曾出现过李商隐研究热潮,出版过不少成就显著的论著。但是,在李商隐生平事迹的研究上,在对李商隐 600 多首诗的阐释上,仍有不少问题没有弄清楚;有不少的解释是错误的。这种情况无疑妨碍了广大读者对李诗的理解。

最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在瀛教授的《李商隐诗集今注》(2001 年 8 月第一版)是作者积数十年潜心研究之功精心撰写的力作,不仅为李商隐研究开辟了新视野,破解了许多疑团,也为广大读者读懂李商隐的诗歌,领悟其思想感情内涵,欣赏其审美意韵,提供了一个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向导。

我读了《李商隐诗集今注》(以下简称《今注》),感到这本书至少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体例严整,注释精审

《今注》的体例充分考虑了读者理解上的需要。全书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一个统括全书的长达 34 页的前言,阐述的内容包括李商隐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前人和今人研究李商隐诗歌的得失,如何看待李商隐诗歌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篇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李商隐诗歌的学术论文,表达了作者对李商隐诗歌研究的独特见解,对读者理解李诗作了鸟瞰式的向导。第二部分是李诗的目录。这个目录对李商隐的 600 多首诗按年代顺序排列,对读者掌握李商隐思想和艺术发展的脉络极为有利。第三部分是对李诗的逐首注释。注释又分“今注”和“简释”两部分。“今注”对李诗中的典故和比较难解的用词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简释”则说明每首诗的创作背景、思想内涵、艺术特点。原诗以四部丛刊影印本为底本,以各种注本相互参校,务求准确。凡用前人之说,必注

明出处。对李诗的每一句都作出明确的解释,深入浅出,化难为易,尽可能不留疑义,也不作过多的发挥,为读者留下思索的空间。此外,《今注》还附有后记,进一步陈述了作者对李商隐诗歌的见解,与前言相呼应。读者一卷在手,就如同掌握了一把开启李诗玄奥之门的钥匙,可以省去许多搜求猜测的气力。

(二)提要钩玄,自出新意

《今注》对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作了实事求是的回顾和总结。一方面对前人和今人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凡有精到之处必吸收采用并加以注明,不掠人之美;一方面又对前人的笺注、今人的疏解中的疏漏纰缪、穿凿附会之处据实纠正,对流行的偏见和陋见则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许多人往往把李商隐大量的爱情诗附会为政治诗,如同把《诗经》的《关雎》篇解释为颂文王后妃之德一样。《今注》指出,这样的诗在李诗中是有的,但决非都是如此。比如有人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也说成是巴结令狐绹之作,就是郢书燕说、想入非非了。实际上,李商隐相当多的爱情诗就是爱情诗。而且,作者还认为“最能代表李商隐的诗歌成就的是他的享誉千秋的爱情诗”,这些爱情诗“有意埋没事情的真相,以‘隐僻’的形式表达他的爱情,令我们感受到它的美丽、深邃和神秘,事幻而情真,猜不透,说不尽,这正是诗人要达到的目的”。因此,作者认为“不必苦苦搜求李商隐的恋爱对象,也不必将爱情诗曲解为‘寓言’、‘托讽’、政治诗,而是要承认商隐爱情诗的不朽的价值和崇高的地位”。他据实批驳了宋朝人所作的唐书本传对李商隐生平事迹的歪曲,批驳了清朝的一批进士、翰林对李商隐诗歌的贬抑和谩骂,指出李商隐决不是什么“放利偷合”、“诡薄无行”的人,而是一个有正义感、有报国之志、重感情、重友谊的人;他同情人民的疾苦,不满当权者的昏庸,宦官的专权,藩镇的跋扈,甚至敢于用诗歌批评皇帝,指责朝廷,在这方面他甚至超过了杜甫。只是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毁灭了李商隐的理想,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尝开”而已。作者还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将中国古代抒情诗发展到了极致”,是“诗学和美学上的重大变革”。研究李商隐的诗歌“既要求得真事实,更要予以新价值、新意义”。他认为李商隐应该与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一样进入伟大诗人之列。他提出:“要研究李商隐,就必须解放李商隐,要解放李商隐,就必须解放研究者自己。”这些精辟的见解给我们以很多的启发,为如何欣赏李商隐的诗歌提供了方法论。

当然,诗无达诂。对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艺术作品的诠释都包含着时代的影响和诠释者的主观因素,无所谓“绝对”正确。认定一种万古不易之论,反倒胶柱鼓瑟了。即使起义山于地下,他也未必完全同意别人对他的诠释,甚至他自己对自己创作时的情感活动也未必说得清楚。这正是艺术品万古常新的生命力的奥秘。然而诠释究竟还有正确与谬误之分,深刻与肤浅之别,学术水平的高下还是有客观标准的。郑在瀛教授的《今注》,我以为属于高水平之列。

《今注》的出版,不仅为李商隐研究增添了一项有重要价值的新成果,而且为帮助人们探寻中国古代诗歌宝库、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提供了入门的向导,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

(责任编辑 何良昊)